

御史服冠寓意深

●张楚涵 马 鹏

在中国古代，服饰是礼制的重要载体。由布衣、白丁、黄袍加身这些词语可见，古代服饰除遮蔽保暖外，还具有区别身份、划分等级的功能，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历代史书中也有专门的“舆服志”来记载各个朝代的礼仪文化与衣冠服饰。

在《宋史·舆服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今制，朝服用绛衣……惟法官授用青地荷莲锦，以别诸臣。”“今御史台自中丞而下至监察御史……既正定厥官，真行执法之事，则宜冠法冠，改服青荷莲锦绶……”所谓朝服又称具服，是官员在朝会、祭祀等重要礼仪场合时穿的礼服。这段记载说的是宋代监察官员的正式礼服的绶和冠与其他官员有所不同，不仅在绶带材质上使用有别于群臣的青地荷莲锦，头冠也配獬豸角，显示其监察百官职能所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之处呢？正如《宋史》所言，“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所谓台谏，便是台官与谏官的合称。台官指监督官吏的官员，如御史中丞；谏官指讽谏君主的官员，如拾遗、补阙。到了宋



传说中头上长角能触奸邪的獬豸石雕。

代，台谏逐渐有合一的趋势，言事谏正成为了御史的重要职能。

这在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已经指出

“秦汉以来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的台谏之权，在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了御史与谏官制度合一之势。这种台谏合一的结果，使监察制度在国家体制的运转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构成了强大的制约。”

宋代监察制度取得一定成效，主要是由于宋代君臣之间对谏议具有深刻的理解。直言敢谏是忠于职守的表现，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了刚直不阿的包拯，他担任过监察御史、御史中丞、知谏院等职，做到了“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

宋代对监察官员的选任是十分严格的。御史中丞由皇帝亲自任命，此外还有官僚举荐的制度，朝廷下令让群臣举荐人选，皇帝从被举荐的人选中任命。御史的人选要求不能有贪脏枉法的前科，如果有此类事件被查出，那么举荐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总之，宋代十分重视改革和完善监察制度，对监察官员的朝服配以“特殊待遇”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今我们提到绶，通常会想到“绶带”。的确如此，宋人在穿着正式

服装时，会腰系绶带，不仅用于固定服装，更体现其身份地位。历朝历代的绶有使用丝线编结而成，也有玉佩珠饰串联而成，在宋代则使用织锦，因此也被称为“锦绶”。而监察官员的青荷莲锦绶，谐音“清廉”，包含了对监察官员为官处事要格外清正廉洁的寄托。

古人所戴的冠也不只是为了保暖或美观，同样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獬豸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异物志》的记载，“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相传，在双方对簿公堂之时，獬豸会用自己的利角，果断顶倒违法失德之人，獬豸逐渐成为了司法公正的象征。獬豸冠则是春秋时期楚文王所制，将象征獬豸角的装饰加于冠上，后成为御史等具有监察执法功能官员的官帽，宋代也延续了这一礼制。

宋代监察官员服冠，有如此深刻的寓意，这又何尝不是对监察官员的鞭策鼓励呢？须知要做到维护国家纲纪法度，才对得起自己的这身服冠。

黄裳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记者，在戏剧、新闻、出版、藏书等领域均有建树。黄裳究竟使用过哪些笔名，连他自己都记不清。2006年，他曾在的一封信中说：“旧用笔名，几百百数，难以遍忆……”（董宇文《〈我的笔名〉编后记》，《书脉人缘》，青岛出版社2019年1月版）

2022年9月，钦鸿、徐遇翔、周彬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所收黄裳笔名，除其本名容鼎昌外，计有24个，即鼎昌、宛宛、流水、秋远、朱孚、芳垂、范莱、勉仲、叔孙遥、赵令仪、楮冠、华皎、鲁昔达、默庵、庾持、南冠、韦禽、吴咏、何戡、黄裳、黄伯思、方兰汝、旧史和杨廷。这个数量虽离“百数”尚有不小差距，但与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收录黄裳笔名11个）相比，已经相当可观了。

据我所知，黄裳还用过三个笔名，可惜我不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编者，不然早就提供给他们了。

一是“虞荔”。

2004年12月16日，黄裳写过一篇《我的集外文》。文中，他说柯灵编《商情午报》，曾请他承包一整版副刊，“设有六七个栏目，用不同的笔名”。又：“从旧日记里查到，我写的文字有《谈赛金花》，时为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所用笔名有‘虞荔’等”（《来燕榭文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按黄裳自述，他在《商情午报》上以“虞荔”等笔名发表了《谈赛金花》等大量作品。遗憾的是，这张报纸现在很难见到，否则我们至少可以找到《谈赛金花》和其他署名“虞荔”的作品。

二是“黄皆令”。

黄裳以笔名“黄伯思”在上海《文艺春秋副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谈何其芳》，载1947年1月15日第1卷第1期；另一篇是《关于废名》，载1947年3月15日第1卷第3期。这两篇文章均已收入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版《来燕榭集外文钞》。

在《关于废名》附记中，黄裳说：“这是我写的一篇读书记之类的东西，发表在重庆《大公报晚报》的‘小公园’上。”据此线索，我找到了这篇文章，是刊在重庆《大公报晚报》1946年10月16日第2版《小公园》副刊，但署名不是“黄伯思”，而是“黄皆令”。在内容上，《大公报晚报》本与《文艺春秋副刊》本几乎完全相同。

重庆《大公报晚报》本《关于废名》开头写道：“前边讲过了俞平伯，现在来看废名。”经查，讲俞平伯的文章，题为《关于俞平伯》，载重庆《大公报晚报》1946年10月13日第2版《小公园》副刊，署名也是“黄皆令”。重庆《大公报晚报》上还有一篇署名“黄皆令”的文章《关于“破门文件”》，载1946年10月23日第2版《小公园》副刊。文章一开始就讲：“前边说了俞、冯两位，现在该讲到沈启无了，这位被周作人称为‘小徒’的人物。”可见，这篇文章也出自黄裳之手。

三是“伯思”。

1946年，黄裳在重庆《大公报晚报》副刊《小公园》上发表不少作品，大多未收入已出版各种黄裳作品集，应属于“来燕榭集外文”。其所用笔名除“黄裳”“黄伯思”“黄皆令”外，另有“伯思”。据不完全统计，署名“伯思”的作品有《京尘影事录》之七（9月23日）、之八（9月24日）、之九（9月30日）、之十（10月2日）和《关于苦雨斋打油诗》（11月24日）。

黄裳似乎喜欢以前人的名字用作自己的笔名。

关于“黄裳”笔名的来历，说法不一，或谓黄裳是黄宗英的忠实“粉丝”，“黄裳”意即“黄的衣裳”；或谓“黄裳”本是黄裳为黄宗江所取的艺名，黄宗江不用，黄裳则用作自己的笔名；或谓抗日战争后期，黄裳在云南给盟军当翻译官，“黄裳”乃取其“身着黄色军装”之义；或谓源自清代才子佳人小说《平山冷燕》中平如衡的诗句“玄黄妄想裴公子”（系化用《诗经·七月》“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但从黄裳发表作品时既用“黄裳”又署“勉仲”来看，这个笔名或许来自宋代黄裳的名字亦未可知。宋代黄裳（1044—1130），字勉仲（一作冕仲），文学家，有《演山先生文集》行世。

虞荔（502—561），梁代大臣，著有《鼎录》。黄伯思（1079—1118），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家、书画家、收藏家，著有《东观余论》等。黄裳饱读诗书、博览群籍，“虞荔”“黄伯思”两个笔名，大概也是他借用的。

“黄皆令”更是如此。明清之际的名媛、诗人、画家黄媛介，字皆令，是柳如是的女中密友。1963年前后，黄裳应香港《大公报》编辑陈凡之约，撰写了一部以晚明史事为题材的小说《鹭湖记》，黄皆令是其中的人物之一。黄裳曾托周汝昌协助索取天津博物馆所藏柳如是《月堤烟柳图》副本，图上有黄皆令题诗（参见周伦玲《黄裳和他的小说〈鹭湖记〉》，《文汇报》2021年12月12日第8版）。

要想弄清黄裳的全部笔名及其来历，尚非易易。倘若黄裳健在，发现疑似他的笔名，可通过各种方式请他确认。黄裳生前，就为《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编者提供过材料或做过审核纠正工作。但现已没有这样的机会，考证其笔名的难度恐怕更大了。

黄裳的笔名

●陈建军

■ 我看我说

儿童节说

●赵献东

六月初，生机勃勃；春留余韵，夏暖山河。风拂翠绿，百态绰绰；妙意横生，趣味多多。当此万物竞发之际，喜逢童稚烂漫之节！

孩童稚者，童心之载体也；童心者，人心之本源也。无忧无思，天真纯粹；灵智始萌，知著见微。自然明净，初心淳美；气韵浑然，笃实光辉。嗟乎！人之长成，皆由儿童；去而不返，百虑萦胸；回望过往，笑语盈盈；纯真宛在，烦恼一空。由是可知，六一节

日之乐非只儿童，成人亦为之而喜庆。

然则，流连于斯虽美，追溯其缘则痛。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战硝烟之中，德国纳粹，滥施暴行。妇孺殄零，壮男童婴，或亡于枪口下，或虏至集中营。惨无人道，史册永铭；后人念之，以悼以警；一九四九，儿童节定。

时光荏苒，风雨涤荡；和平之光，沐浴东方；盛世中华，儿童茁壮。每逢六一节庆，华夏喜气洋

洋；室中但有小儿，举家倾情欢畅。校园内外，神采飞扬；游乐场上，笑声回荡。此情此景，令人神往；如逢甘露，如饮醇醪。盖儿童者，人类之未来，家庭之梦想，祖国之花朵，民族之希望。固应守护其童心，庇佑其成长。正所谓：今朝童声儿语，明日锦绣华章。

故知六一之情怀，在于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六一之意义，在于鼓舞新生，护佑儿童。一家之气氛，可观其童稚之精神；一世之风采，可观其童稚之状态；一国之治道，可观其童稚之面貌。昔梁任公公有“少年中国说”，其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世界则国雄于世界。此乃不刊之论，至理名言。然少年亦由儿童长成，有康乐之儿童，方有强健之少年。而今儿童节，在于儿童，吾可言“儿童之中国；儿童健则国健，儿童乐则国乐，儿童浸于友爱则爱心溢于中国。

美哉，吾中华之儿童，茁壮成长！妙哉，吾儿童之中华，大爱无疆！

《尚书》中的修身智慧

●葛斯青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有“政书之祖，史书之源”的美誉。《尚书》垂世立教，上至唐虞，下至秦穆，内含“典”“谟”“训”“诰”“誓”“命”。《尚书》文本有亦经亦史的特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满招损，谦受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等言论体现出德为政本、敬德保民、勤俭戒贪、任贤尚公、明德慎罚、刑以弼教等治道思想，反映出中国古代先贤的德治理念。我们可从其中汲取智慧，在提高自身品德修养的过程中实现修己安人。

修齐治平 尚公任贤

治国必先修己，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尚书·尧典》记载，尧帝诚信谦和、恭谨礼让，德行的光辉普照四方。他弘扬美德、亲睦九族，又使贤明之士得到任用，四方各国协调和顺，民风民俗也变得十分和谐。细而品之，文中“克明俊德”谓尧能够显扬修身之德；“以亲九族”指尧帝能把修己用于齐家，使亲族和睦；“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言尧帝将修身、齐家之功效扩至治国；“百兹昭明，协和万邦”言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中可以看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向外，层层推进，层层递进。

家因天下本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其中的基础便是修身。《尚书·伊训》亦言：“爰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爱敬之风起始于家庭和邦国，最终扩展到整个天下，强调自身修养的提高是治理水平提升的前提。为政者应从自身做起，敬爱亲长，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效果。

修身之要，正心为本。为政者必须要有一颗公心，尚公方能任贤，以公心从政，落实到行为上自然不能以自己的私意为考量前提。根据《尚书》的记载，尧帝在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时，听说民间有一位贤人虞舜，于是多次用难事来考察他能否胜任。尧帝让他传布“五典”，以美德教化百姓；让他摄理百官事务，迎接来朝的宾客；让他进入山林，接受风雨的考验。虞舜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尧帝认为虞舜的德行和才干可以担当，就在太庙举行了禅让仪式。舜接受禅让以后，继承了尧的治国之道，向四方首领虚心请教，咨询政事，并招贤纳士，让众多贤能的人都汇集到自己身边。尧帝禅让虞舜，却不传其子丹朱，这是因为他认为不能损害天下人來使人一得利。他始终以大局为先，以公心为上，以百姓的利益为重。

《尚书·太甲下》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意思是说，不论别人说的话是否迎合你的心愿，都要从是否符

合道义的角度来考求。党员干部对待公务要时时守住公心，事事出于公心，以大局为重，做到严以修身，严以律己，树立良好家风，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克勤克俭 无怠无荒

贪欲是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绊脚石。贪则办事怠惰、不公，也势必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尚书》警示执政者务要戒除贪逸、贪名、贪利、贪酒、贪物、贪玩等恶习。

《尚书·大禹谟》中谈道：“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不要违背正道来求民众的夸赞，也不要违背民众来顺从自己的私欲。前者说明为政者不要因为好名而做出违背正道的事情，后者强调不要放纵私欲，这样会使百姓受损。

《尚书·五子之歌》记录了“太康失邦”“后羿代夏”的故事。太康好游猎，久出不归，民众生怨。有穷国国王后羿便取代了他的政权。五个兄弟怨恨太康，追述大禹的训诫而作歌。其中一首为：“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意思是，执政者如果在内沉迷于女色，在外迷恋游猎，沉湎于美酒、淫乐，追求高大的宫室、奢华的住所，这几种情况但凡染上一种，没有不亡国的。

在《尚书·伊训》中，伊尹回顾了先王制定的纲纪，将三种恶劣风气、十种劣行定为“三风十愆”，让大家引以为戒：有胆敢经常在宫中观赏舞蹈，在家中醉酒高歌的，叫做巫风；有胆敢贪图财物、女色，经常游乐围猎的，叫做淫风；有胆敢轻慢圣贤的言论，拒绝忠直的规劝，疏远年老德高者，亲近小人的，叫做乱风。这三种风气、十种劣行如果沾染其中之一，国家就会陷入危险。

《尚书·旅獒》记录了周武王灭商以后，开辟了通往西部周边少数民族的道路。西方的旅国用当地名贵的獒犬前来进贡，但是正在做太保官职的召公觉得这个礼物不能收，于是作《旅獒》，提醒周武王“玩人丧德，玩物丧志”，要时时处处

以慎德为本，不要开启玩弄奇巧异物的风气。比起重视远方的珍宝，重视贤能的人才，国家才能安定。一心一意把国家治理好，远方的人们自然愿意归附。

《尚书·酒诰》则记录了殷商灭亡不久，文王之子康叔被封卫国时宣布戒酒诰词的故事。康叔被封时，尚且年幼，周公担心康叔饮酒腐化，就让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令，只有祭祀时方可饮酒。

除了警戒为政者不要纵欲，《尚书》还劝告为政者要时刻勤勉上进，不可懈怠，并以勤俭节约为美德。《尚书·无逸》写道，周公在还政给周成王之际，提醒周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要知稼穡之艰难，知小民之疾苦。唯有不断进行自我净化，才能免于商朝被周取代的结果。

莫生贪情意，休起荒怠心。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克制过分的物质欲望，在生活上勤俭俭朴，在工作中勤于政务，不能怠慢和松懈，真正去了解民生，掌握真实情况，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办事。唯有如此，才能永葆初心本色，永得人民拥护。

不矜不伐 日新己德

领导干部能够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极为关键。《孝经》言：“在上不骄，高而不危；节制谨慎，满而不溢。”当身居一定职位时，唯有时刻保持谦虚、谨慎，才不会有倾覆的危险。

《尚书》中不乏教人谦虚的句子，在《尚书·大禹谟》中，舜帝嘱咐大禹：“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这是在说，禹推善让人，反而不失其能；有了成绩不居功，反而他的功劳谁也无法否认。《尚书·说命中》说：“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当一个人自恃其功的时候，反而会在别人眼里丧失功绩。

《尚书》亦用历史证明了“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的盛衰之道。《尚书·大禹谟》记载，三苗部族残害百姓，道德沦丧，舜帝曾经派大禹去征讨三苗。三苗虽然暂时被武力震慑住了，但并没有完全被征服。伯益建议说：“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至诚之心是可以感化人的，禹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即撤回了军队，对三苗进行礼乐教化，后来，三苗终于主动前来归顺。可见，耀武扬威没能使对方屈服。放弃武力，以德感怀反而使人心口服。《尚书·汤诰》记述了商汤灭夏后放逐夏桀，认为自己有愧于古贤之德行，悔其过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商汤盛德，依然恪守常法。而商纣王目中无人，自以为天命所归，虽有“亿兆夷人”，终是“离心离德”，军队临阵倒戈。

以史为鉴，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在学习上不自满，在生活中平等待人，遵规守纪，避免在取得成就后骄傲自满，方能行稳致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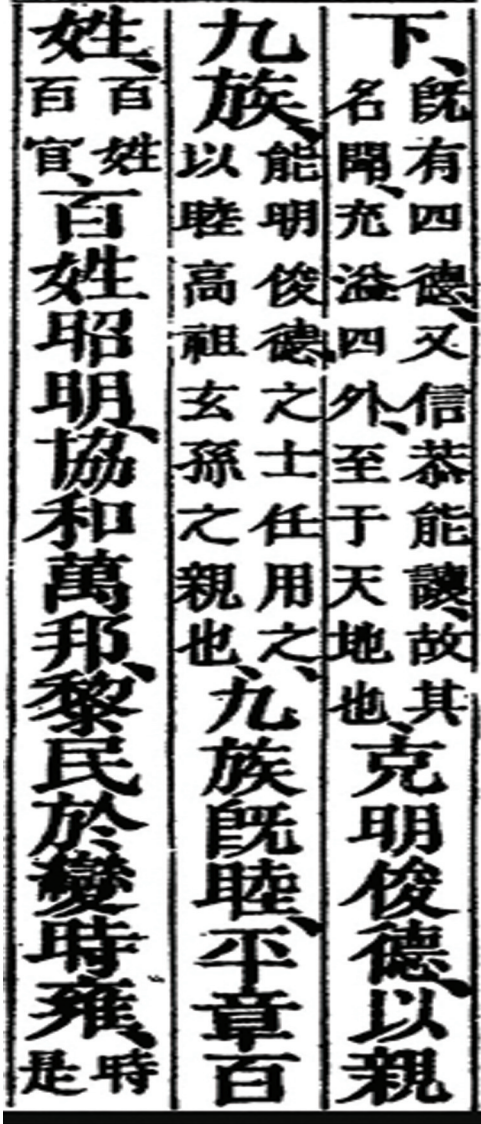
好生恶杀 刑期无刑

孔子曾说“仁者爱人”，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亲善友好，做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政者在制定政策时要发用仁爱之心，充分发挥以德感人、以德教化的作用，以人心向善、社会和平安定为导向，教化人们，而不是单纯为了惩戒人们。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表示，审理诉讼案件，自己同别人也是一样的，重要的是使诉讼的案件根本不发生，希望它能够以德化人。《尚书·大禹谟》中记载，“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使用刑罚是为了以后能够不用刑罚，让民众合于中正之道。《尚书·吕刑》亦言，断案需要公心，要以怜悯之心、谨慎之心判决案件，比起口才好却巧言善辩之人，贤明良善之人才适宜断案。

道德教化能防治祸患于前，领导干部当知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人们成为内心良善的好人，比对犯错之人处以严厉惩戒更有长远助益效果。

《尚书》呈现了虞、夏、商、周的兴替盛衰状况，其经史互参互证的文本特质展现了“德立则国治，德失则国危”的历史规律。尧帝“允恭克让”，国家兴盛；太康贪图玩乐，丧失政权；夏桀暴



图为《群书治要·尚书》刻本书影。

虐无道，商汤取代；商汤以仁爱立国，不拘一格任用出身卑贱的伊尹，国家兴盛；伊尹劝扶太甲，使其改邪归正；商高宗武丁重用能臣传说，实现“武丁中兴”；纣王荒淫无度，百姓离心离德，终又被周所取代；周公辅佑成王，东征平叛，劝王以德，天下安定。此类事件记载，体现了执政者立德修身与王朝兴衰的面貌，突显了修身立德、推行德政的重要性，值得党员干部学习借鉴。